

西方学者对中古后期英国世俗贵族 群体政治活动的历史解读*

孟广林

【提要】 西方史学界对中古后期英国政治史的研究素来聚焦在对议会的考量上。然而,要全面理解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政治史,仅仅研究议会的历史是不够的,还应该研究那些在议会内外活动的政治势力尤其是世俗贵族群体的活动,因为它们对议会活动的主题与限度乃至整个王国发展之政治走向具有重要的乃至关键的影响。探讨那些在王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贵族即所谓的“超级臣民”因而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古后期 英国世俗贵族 群体政治活动

一、世俗贵族群体的基本定义与分类

多年前,笔者在论及 11 至 13 世纪初的英国封建王权时,曾对英国贵族的构成做过探讨,指出在诺曼征服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英国世俗贵族主要是指那些以血统和军功而获得大地产封赐且频繁参与王国政务的封建主。^①

到了中古后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动与发展,英国的社会等级结构虽然继续延续,但作为特权社会阶层、特定“政治共同体”的世俗贵族(Aristocracy),其阶层的构成及其社会身份特征有了某种嬗变,而且贵族群体中的社会分层有了明显发展。著名史家希克斯指出,在 1150 至 1350 年间,“贵族都是王权的总封臣”,其中伯爵总共超过 12 个,男爵(baron)为 200 多个,他们的财富占有差别很大。“而在 1350 年后,贵族常常是精选出来的和分层的”。^② 不过,在希克斯看来,尽管如此,贵族仍旧构成了社会的最上层,“所有的大领主和大多数私家臣属都是地产精英或贵族的成员”,他们因系“世袭的军事等级”,主要靠其地产生活。^③

希克斯的上述看法应是西方史学界的大致共识,不过,在对世俗贵族身份的具体衡量和研判上,不少史家更作了深入辨析。据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威尔逊考量,在 12 世纪到 13 世纪末,处于世俗

* 本文获得 2013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世纪后期英国贵族群体政治活动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13DSS011。

① 参见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第三章,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M. A. Hicks, *Bastard Feudalism*, London, 1995, p. 5.

③ M. A. Hicks, *Bastard Feudalism*, p. 6.

社会顶层的贵族,被统称为“男爵”(baronage),大约有 200 个家族。在这个阶层之下,则是骑士或乡绅(gentry)阶层,即在经济上崛起的地主阶层,大约有 3000 名,其土地收入至少每年 20 镑以上。^①然而,作为“男爵”的贵族家族,在 14 世纪初期王家的有关令状、文件中,对其称谓并非一致,而常常冠之以“大贵族”(prelate、magnate)、“伯爵”(earl)、“男爵”(baron)的称号。实际上,很难将前两类家族严格区分开来,但“男爵”家族大致是处于“大贵族”、“伯爵”之下的等级。在如何对这几类家族作科学区分上,史家普瑞斯维奇则提出了细致的诠释。他指出:作为一个“男爵”并非就能被君主授予特别的权利和权力,“男爵被用来称呼大约百来个家族的首领,这些家族拥有财富和影响,位列于拥有男爵领的伯爵之下”。同时,在 14 世纪初期,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之为男爵,主要是依据他从国王那里获得一块男爵领的土地占有权,并向国王提供封建支助金。^②普氏进而指出,伯爵无疑是中世纪后期英国贵族的精英。细分下来,“男爵”中的一部分是显赫的有头衔的大贵族。在 1337 年以前,唯一的世袭下来的头衔除了国王以外,就是伯爵。伯爵拥有的财富、身份和政治影响都是其他任何贵族无可比拟的。在 14 世纪初,兰开斯特伯爵所拥有的地产年收入高达 12,000 镑。而格罗彻斯特伯爵的收入只有前者的一半,但却是王国第二位富有的贵族。1314 年,该伯爵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拥有 160 个庄园,外加在其领地中的 19000 英亩土地^③。其他的伯爵也都是田连仟佰、富可敌国的大贵族。^④

自 14 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议会上议院的形成和公爵爵位的设置与分封,世俗贵族的身份、地位特征有了一些变化。能否参与议会政治活动也成了界定贵族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参照指标。在议会上议院中,贵族开始使用“男爵”(baron)与“贵族”(peer)的称谓。这样的称谓当然和作为土地占有的“男爵”相互关联,但却有了独特的政治特权含义。著名史家麦克法兰认为:“一个议会贵族”(a peer of parliament)的确来自贵族阶层,但并非所有贵族都可以天然具有这种政治身份。早在 1374 年,王国的大法官伯尔克拉普(Belknap)曾经认为,所有占有一块男爵领的都应该作为“男爵”参与议会。对于此说,麦克法兰指出,“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史实,这是因为“只有国王召集的那些人才能参与议会”,“大领主是贵族(peers),如果他们没有这个高级的(peers)头衔,那他们只是男爵”。^⑤稍后,一些史家沿着麦克法兰的理路,阐发了这一观点。针对史学界逐渐流行的“议会贵族”(Parliamentary Peerage)这一术语,威尔逊更是力图作精确的阐释。^⑥在他看来,“议会贵族”有几个层次:首先是公爵、侯爵和伯爵,他们都是这个显贵群体的当然成员,但不是唯一的成员。在 14 世纪,英国的“议会贵族”构成了一个地位显赫的权贵阶层,大约有 70 个家族的人组成了这一特殊的贵族社会群体,他们在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优于其臣属的程度远远较一个世纪前凸显。威尔逊分析说,“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拥有被拒绝给予较小的领主的特殊的特权——在某些案件上拥有只被他们自己的同等地位之贵族审判的权利,和接受单独地征召参与议会的权利”。^⑦正是因为能依恃特权

① Chris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Community*, London, 1987, pp. 18 - 19.

② M. Prestwich, *Plantagenet England 1225 - 1360*, Oxford, 2005, p. 353.

③ M. Prestwich, *Plantagenet England 1225 - 1360*, pp. 354 - 355.

④ M. Prestwich, *Plantagenet England 1225 - 1360*, p. 355.

⑤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24.

⑥ Chris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 p. 55.

⑦ Chris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 p. 65.

而能有规律地出席议会,这个贵族群体对王国事务十分了解,具有较强的政治内聚力和参政意识。

在15世纪,组成这个贵族群体的成员来自大约60-70个家族,他们以拥有或多或少的接受议会的单独征召的世袭权利,而与其他的地主阶级区别开来。“他们就是议会贵族”^①。威尔逊还强调,“如果一个人被征召到议会,那他就是贵族(peers)……任何没有被征召到议会的人都不是贵族(noble)”。这一情况,特别是在“议会从一种偶然的场合发展为一种制度”后,更是如此。^②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上议院”(House of Lords)贵族的辨析来进一步探讨。布朗指出,在议会中,参会的“议员”(Lords)这个称谓,在14世纪40年代开始在王家令状中使用,用以指所有单个被征召参与议会的贵族。到14世纪末,这个称谓正式使用,而“教会议员”(Lords spiritual)和“世俗议员”的称谓普遍可见。而“世俗议员”正是世俗的“议会贵族”的代名词。^③学者皮尤更进一步指出,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上议院的建立,标志着英国社会史的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为从此以后,只有议会贵族的家族,才属于贵族”。^④

麦克法兰、威尔逊等人对“议会贵族”的界定,无疑为史学界的进一步研究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坐标。但征诸相关的议会档案的名单可以发现,在1321—1322年和1327年、1377年等政治动荡时期,被征召的参加上议院之人员的出身也有一定的变动。因此,“议会贵族”群体其实也是有变化的,真正的权贵,则是其中君主信任与宠爱的大贵族。威尔逊本人通过统计也承认,在14世纪,有将近300个家族的人曾经被征召进议会,但其中只有30个家族的人员自始至终地被征召进议会,他们中包括大贵族家族的伯爵,如比尤钱普、菲兹兰斯和威勒斯,还包括没有接受过伯爵位的大贵族家族,如伯克利的伯克利(Berkeleys of Berkeley),赫尔姆斯莱的罗瑟斯(Rooses of Helmsley),等等。^⑤

从当时英国的君主政治来看,之所以出现“议会贵族”群体名单变动的状况,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由于贵族家族自身的兴衰不定。麦克法兰曾统计,在14和15世纪的每个25年中,平均有27%的贵族家族覆没。^⑥普雷斯维奇给出的数字是:“从1300至1500年间,议会贵族(Parliamentary Peerage)覆灭的比率是27%”。^⑦而威尔逊也承认,13世纪的大贵族家族,许多都在14世纪覆没了,除了那些继续拥有伯爵位的家族外。^⑧在这一现象中,政治动荡与王朝鼎革带来的变化尤为明显。有史家曾经论证,15世纪后期玫瑰战争“导致了一个新的约克派贵族阶层的产生”,在推翻兰开斯特王朝后,约克王朝的爱德华四世在其统治的22年间,封赐或恢复了至少35个“议会贵族”(Peerage)的头衔,封赐了4位公爵、两位侯爵、11位伯爵、两位子爵和16位男爵。^⑨导致“议会贵族”群体变动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国王的统治政策的调整。国王为维护自己的尊威而常常采用“保旧擢新”的政

① Chris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 p. 56.

② Chris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 p. 56.

③ A. L. Brown, *The Governance of Late Medieval England 1272 - 1461*, London, 1989, pp. 180 - 182.

④ T. B. Pugh, "The Magnates, Knights and Gentry", in S. B. Chrimes, ed.,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1399 - 1509*, Manchester, 1972, p. 96.

⑤ Chris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 pp. 64 - 65.

⑥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p. 59 - 60.

⑦ M. Prestwich, *Plantagenet England 1225 - 1360*, p. 359.

⑧ Chris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 pp. 64 - 65.

⑨ T. B. Pugh, "The Magnates, Knights and Gentry", p. 90.

治权术,既重用效忠于己的贵族,同时也擢用其宠信的出身寒微的“新人”,让其参与议会和政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因效忠、婚姻等因素而跻身贵族阶层并被征召到议会参政的“新人”,其中有的甚至权势显赫,但史家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不尽一致,有时甚至在相关数据统计上存在冲突。例如,麦克法兰认为,“新人”现象并不鲜见,如在1400至1424年,就有11名“新人”进入议会而成为贵族^①。但据鲍威尔和沃利斯统计,自从菲利普·德斯彭瑟在1388年被国王理查德二世首次征召进议会而成为新贵族后,一直至1425年,没有一个“新人”被征召进议会。^②

事实上,在如何界定与分层贵族群体时,不仅“新旧交替”的现象值得关注,而且仅凭单独获得国王征召参与议会作为考量的参照未免狭隘。为了求得更为准确的诠释,一些史家放开视域作全面探讨。在这方面,著名史家罗森瑟尔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见解。他认为,在中古后期的英国,应该从财富、权力与世袭地位来界定贵族^③。由此,必须将视野聚焦在两点上,“一是作为精英领袖的贵族:世俗的男性,深深卷入国家和地方的事务。这就是议会贵族(the parliamentary peerage)”;再就是“作为社会贵族家族之首领的贵族(peer)”。这两者之间有时是分开的,有时则是合一的。实际上,“贵族(peer)和其家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扮演多重性的角色,他们在各个政府统治的层面上都是一种力量”。^④ 罗氏通过深入研究指出,从1295年爱德华一世的“模范国会”至1500年,英国共有这样的“议会贵族”740人,其中既有公爵、伯爵等拥有大量地产、在地方权势显赫的大贵族,也有相当多的通过朋友、战争、庇护和官职而勃兴的政治“暴发户”。因此,议会贵族中,“新人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一”。^⑤ “议会贵族与‘上层阶级’之间并不能简单等同,位于顶层的贵族在社会中扮演特殊的角色”。^⑥

另外,有的史家在研究中还将当时正在崛起的乡绅(gentry)阶层纳入“贵族”的范畴。威尔逊在自己论述贵族的专著中,就专门辟有“乡绅”一章来叙述^⑦。但西方史学界一般都不认为乡绅属于贵族阶层。有史家就指出:这一时期的乡绅大约有6千至9千家,他们是“介之于贵族(baronage)和约曼(即富裕农民)之间的土地所有者”。^⑧ 尽管乡绅阶层大量充任地方上的各类官员,其代表也参与议会下议院,但如若按照经济、政治地位和身份来衡量,这个阶层其实只是富有的小地主精英。

二、有关贵族群体对王权的反叛与政治诉求

中世纪后期英国贵族的权势依旧显赫,对王国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封建君主封赐仍然是贵族获得地产、爵位、职位的唯一途径,这使得贵族群体有着强烈的阶层认同、身份

①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75.

② J. E. Powell & K. Wallis, *House of Lord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68, p. 436.

③ J. T. Rosenthal, *Nobles and the Noble Life, 1295 - 1500*, Introduction.

④ J. T. Rosenthal, *Nobles and the Noble Life, 1295 - 1500*, p. 2.

⑤ J. T. Rosenthal, *Nobles and the Noble Life, 1295 - 1500*, p. 3.

⑥ J. T. Rosenthal, *Nobles and the Noble Life, 1295 - 1500*, p. 2.

⑦ Chris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Middle Ages*, pp. 69 - 83.

⑧ T. B. Pugh, "The Magnates, Knights and Gentry", p. 97.

认同与利益认同,由此而必定要维护君主政治,并且积极争取广泛地在王国政府中参政议政。因此,贵族不仅主导议会上议院,而且构成了王国行政中枢——“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的主体。此外,贵族更担任王国的各类重要官员和军事将领,并履行安抚地方的职责。由此,贵族群体在王国的政治决策和实施统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随着城市市民和乡绅阶层的兴起,下议院的政治功能日益凸显,但下议院的陈情、税收批准权和立法动议是在上议院的支持下才可能得以顺利实施的。在议会中,贵族在法令制定、弹劾大臣乃至阴谋篡权等诸多方面,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曾有史家对那种贬抑上议院权力而夸大下议院作用的观点予以反驳。^①

另外,这一时期英国曾出现的政治大动荡与王朝鼎革,也格外引人注目。世俗贵族群体与封建君主之间本来就存有封建的权益之争,两者的矛盾在中古后期开始进一步凸显。一方面,随着议会的兴起,贵族开始利用这个议会重要的政治平台与王权展开争夺,为自己的图谋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另一方面,随着“变态封建主义”的流行和对外战争的扩大,大贵族竭力扩充实力,拥有了与王权抗衡的权势。由此,贵族与王权的冲突时断时续,其反叛不仅在议会召开过程中接连发生,而且常常演化为有规模的武力较量,甚至导致废黜君主和改朝换代,如1327年爱德华二世被废黜,1399年安茹王朝的末代君主理查德二世被废和亨利四世创建兰开斯特王朝,1461年亨利六世被废和约克家族新王朝的建立。正是基于这一状况,西方史学界对贵族群体政治活动的研究,更多的是聚焦在中古后期贵族对王权的反叛与政治诉求上。

对于这一学术问题的探究,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多有理路分歧,争论不断。早在19世纪末,基于17世纪“辉格”党人的“宪政主义”思想取向,“牛津学派”的创建者斯塔布斯就认定,中世纪英国的贵族是“古代条顿民族之自由”的传统的践行者,由此而能为全体民众的权利而斗争,产生了《大宪章》那样的限制王权的经典性文献。《大宪章》体现了贵族对“公民权力”的追求,把它看作少数贵族“私人野心”的产物是错误的,是“徒劳的怀疑”。实际上,贵族限制国王暴政的诉求包含了“正当的为人民的焦虑”,《大宪章》旨在追求“没有损害王权的基本特权的调整”,从这些历史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宽阔的胸怀和爱国精神,完全不同那种时常被随意地转嫁给那些古代贵族的自私心”。^②正是象征着“民众权利的方向”和“议会自由的方向”的“14世纪的原理”,导致了1399年罢黜君主的重大事件,让英国宪政有了新的发展。由此,“这个民族懂得,国王不是一个独裁的专制君主,而是一个被誓约、法律、政策和物质需求所约束的主权者”。因此,尽管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理查德二世“在某种程度上是私人的而不公共的目的之结果”,但当时“宪政的力量成熟了”,即使没有亨利为自己复仇,“理查德的暴政也是值得废黜的”。^③

① 例如,著名的议会史学者塞勒斯通过研究发现,有关议会的档案、文件中,“准确地透露下议院议员在议会中的作为的材料几乎没有”。他指出,如果下议院重要,史学家本应获得诸多其活动重要性的原始材料,“有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获得下议院活动的了解,我们必须去参考上议院的记录,在那里看到在下议院议员的请求下,由上议院议员代表偶然召开的会议,同意会见他们的代表以支持他们的商讨意见”。塞勒斯还指出,1460年教皇代表可比尼在英国议会中,亲自见证了是上议院议会贵族在议会废黜英王亨利六世发挥了决定作用,这说明当时的议会并非下议院主导的“‘民主’机构”,而是“国王的议会”,其中议会贵族起着重大作用。参见 G. O. Sayles, *Modern Myths and Medieval Parliaments*, in his *The King's Parliament of England*, New York, 1974, pp. 19-20。

② W. Stubbs, *Lectures on Early English History*, ed. A. Hassall, London, 1906, pp. 345-346。

③ W.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 1896, Vol. 11, pp. 253-254。

斯塔布斯的这一“宪政主义”史学观的“辉格解释”模式,对西方史学界影响深远。然而,对他所赞赏的贵族反叛王权之政治诉求的质疑,在日后的西方史坛仍旧延续不断,且在“二战”以后益发浓厚。例如,在探讨理查德二世时期的政治时,制度史家图特就将桀骜不驯的大贵族代表——兰开斯特的托马斯描述成为一个“苛刻的、怀有报复心的、自私自利的、残忍的和恶毒”的人,“无能的和愚蠢”的人。^①他还认定所有的“男爵”就像其他贵族那样“贪婪狭隘和自私自利”。^②类似这样的分析,此后绵延不绝。^③这种基于人性之“恶”的剖析虽然并非不经之谈,但却带有某种情绪化的色彩。

到20世纪40年代,著名史学大师麦克法兰通过卓越的研究,对英国贵族之生存状态与政治活动作出了独到的精辟解读,对斯塔布斯等人极具主观色彩的“辉格解释”模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麦克法兰指出,尽管当时贵族反叛乃至废黜君主的事件层出不穷,但他们主要还是依附于王权的,因为国王仍然是财富、要职和荣誉的恩赐者,贵族需以此来巩固权益。因此,贵族临朝不仅仅是履行出席和提建议的责任,“而是引起王家注意的需要,假如他们想要按自己的设计而飞黄腾达的话”。^④贵族临朝“不是去表达不可被接受的观点,而是为了他们能够获取的东西”。^⑤也正因为如此,扮演贤明君主的艺术,是国王能否稳定统治的关键:“实际上,国王是所有好领主的好领主,如果他手腕娴熟,就能将所有最强大的臣属包揽在属于自己的亲近群体之中”。^⑥贵族首领将自己视为国王的天然顾问,他们在议会中提出各种意见,“但国王占有支配地位。他采纳或拒绝建议,指示大臣来服从他的命令”。^⑦麦克法兰由此而强调,“有关绝大部分中世纪后期宪政史的根本困境,在于假定国王和贵族的利益相反和冲突的不可避免。这种假定对我来说是不真实的”。^⑧麦克法兰更是反对那种将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图解为贵族反叛王权的政治史。他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的确存在,但也只是偶尔发生的,并非一种常态,且大多系国王弊政所致。发生与不发生的另一关键,也取决于国王自身的强弱与统治措施是否得当,“可能发生的冲突领域是极其小的,任何有能力的国王都容易避免它”。^⑨而对贵族来说,他们需要拥有一个能够确保并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好君主,“他的软弱不会使他们感到欣喜,统治的缺失是一种灾难,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困窘而不是好处”。^⑩麦克法兰强调社会政治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因素,并以对“变态封建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加以印证,影响了一批史学家。他们纷纷沿着麦克法兰的理路对当时的国家与地方的政治史进行探讨,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如哈里斯指出,应该效法麦克法兰去研究“个人和阶级的利益如何影响到政治态度”,研究“政

① T. F. Tout, *The Place of the Reign of Edward 11 in English History*, Manchester, 1936, p. 16.

② T. F. Tout, *The Place of the Reign of Edward 11 in English History*, pp. 21, 135.

③ 参见 A. Tuck, *The Richard 11 and English Nobility*, New York, 1974, p. 102; N. Fryde, *The Tyranny and Fall of Edward 11, 1321 - 1326*, Cambridge, 1979, pp. 3, 13, 44, 49; J. R. S. Phillips, *Aymer de Valence, earl of Pembroke, 1307 - 1324*, Oxford, 1972, pp. 21, 285 - 287.

④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19.

⑤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20.

⑥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20.

⑦ K.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20.

⑧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20.

⑨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21.

⑩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121.

府和政治的实际运作”。哈氏还强调:“如果我们拒绝将代表制度与宪政主义的增涨作为探究15世纪发展的关键主题的话,我们就必须十分谨慎地用庇护制度(patronage)、名利追求、血统、荣誉、等级制度或服役来取代它们”。而要理解地方“政治生活”(political life),就应该探究建立在“地产社会”(landed society)中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领主权与大贵族”。^① 格罗斯则分析说,“王权和贵族的利益很少发生直接的抵牾。只是在社会环境未能留下选择余地时,大贵族才运用其权力反对王权,而且通常是一些孤立的个人这样做”。^② 15世纪的“玫瑰战争”素来被视为贵族反叛王权现象的一个标本,但史家卡蓬特通过细致的研究阐发了独到的观点。他认为,尽管这一时期市民、乡绅阶层的兴起使议会下议院的地位日渐重要,但“政治社会的真正领袖是比较大的贵族”。^③ 正是贵族代表各郡和其下属通过国王的御前会议与非正式的场合向国王提出建议,“在向国王代表王国上”,贵族远比下议院的郡代表重要。^④ 贵族并非王权的天然反叛者,他们只是在受到国王排斥后才表现不满,且基本上依附于国王,“他们渴望通过置自己于国王的支配之下来支撑王权,因为他们需要他,需要他的尊严与他的权威”。^⑤ 卡氏还指出,之所以如此,在于双方最根本的权益一致:“国王和贵族都是统治精英,在获取国家的大多数剩余产品上,在保持一个联合的战线以反对任何下级想对他们的霸权的挑战上,在维护可以确保他们的土地安全的稳定上,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利益”。^⑥ 也正因为如此,贵族倾向于支持王权,希望王权强大,“对于他们来说,一个软弱的国王要比一个强大的国王要危险得多,一个能够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控制的国王也有更多的危险”。^⑦

麦克法兰及其稍后的一批学者聚焦在“物质利益”上来诠释贵族之政治诉求与行为,被西方史学界称为“麦克法兰模式”。然而,在天然拥有民族政治文化传统“自信”的英国,“牛津学派”之“辉格解释”模式对史学界的熏染素来厚重,难以剔除。不过,受“麦克法兰模式”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公开地以“自由”、“权利”之标尺来诠释贵族政治诉求的理路逐渐淡化,而着力阐发贵族的“贤君明君”之理想则越来越多地显示在史家的著述之中。塔克通过对贵族与王权之关系的细致考察而认为:尽管“君权与贵族的冲突”为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政治打上了十分鲜明与深刻的历史烙印,“但设想这种冲突在政治结构中所固有的和不断的,则是不明智的观点”。^⑧ 塔克指出,在英国14与15世纪贵族与王权的冲突中,“存在着某种理想和基本原理的延续,特别是在兰开斯特的托马斯的例子中”,因此才有特殊环境中贵族对君主的反叛和废黜。但一方面的实际情况是:“贵族对君主的忠诚意识非常深厚,虽然这并不像拉尔夫·巴塞特爵士在1387年指出的那样是绝对的或不可动摇的”。因为在这一时期,“贵族在战争中接收了国王的领导,并将国王看做是恩典、地产和官职的源头”。但

-
- ① G. L. Harriss, "The Dimensions of Politics", in R. H. Britnell & A. J. Pollard, eds., *The Mcfarlane Legacy Studies in Late Medieval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1995, pp. 1-2.
- ② A. J. Gross, "K. B. Mcfarlane and the Determinists: The Fallibilities of the English Kings 1399-1520", in R. H. Britnell & A. J. Pollard, eds., *The Mcfarlane Legacy Studies in Late Medieval Politics and Society*, p. 51.
- ③ C. Carpenter, *The Wars of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 1437-1509*, Cambridge, 1997, p. 35.
- ④ C. Carpenter, *The Wars of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 1437-1509*, p. 37.
- ⑤ C. Carpenter, *The Wars of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 1437-1509*, p. 39.
- ⑥ C. Carpenter, *The Wars of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 1437-1509*, p. 39.
- ⑦ C. Carpenter, *The Wars of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 1437-1509*, p. 39.
- ⑧ A. Tuck, *Crown and Nobility 1272-1461*, p. 11.

贵族也有着“贤君”、“明君”的理想,“在良善的政府和司法、军事成功、财政节俭和贤臣挑选以及采纳合适生活方式等方面,他们都对国王抱有很大的期望。只是在贵族意识到这些期望不能实现时,冲突才得以发展”。^①不少史家也都持有类似塔克的看法。同时,一些史家更将贵族的反叛视为国王暴政压迫的结果,且多引用13世纪后期为贵族反叛作辩护的《刘易斯之歌》来加以证明。著名史家马蒂科特更进一步解析了14世纪的政治诗歌,来说明当时贵族的反抗乃是国王暴政压迫使然。他指出,这些作品“以布道、说教和讽刺所展示的作品主干”显示,“明显地被嫁接上了一种新的控诉类型,它植根在真正的冤情之中,使得抗议文学从一般流露转向特别表达”。^②在这方面,史家汉森更是作了颇有创见的诠释。在他看来,“国王与贵族的独有的冲突”,对13世纪以来英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含义”之塑造上有着重要意义,双方的理想原则一直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展示,即“国王和大贵族被授予了独立的合法权威”,这一“持续不断的政治权威之本质的概念”,其理想主旨换句话说就是“分割的主权”(divided sovereignty),国王和贵族都强调各自的主权,要求对方屈从于己。因此,当时的观念始终在统治形式的“专制王权”或“有限王权”之间碰撞与冲突^③。

正是循着上述理路,不少史家为了将贵族的政治动机升华到反对君主独裁的“有限君权理想”(The Idea of Limited Monarchy),着力于诠释中古后期英国的所谓“规劝文学”(advice literature)作品,即可被视为“君王宝鉴”(mirrors for princes)之类的作品。著名政治史家华兹就指出,“认为君王宝鉴是决定贵族政治意识形态中占有支配地位的形式,这一观点已经被(当时的)某些关键文本的传播所证明”。^④他引证说,赫科勒维在1411至1412年为日后成为亨利五世的威尔士亲王所撰写的《王子军团》(Regement of Princes)正是根据大陆的一些著名“规劝文学”版本撰写成的,这类文本“的确诉诸于贵族的文学情趣”,其通过规劝的方式所凸显的以社会“安宁”、“繁荣”为意旨的王国的“公共利益”(common weal)与君主为实现此目标所需要的政治美德,“为贵族和其下的民众所熟悉”^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期以揭示“君主宝鉴”中贵族群体之“有限王权”理想的解读,或多或少地仍旧显示了“辉格模式”的诠释韵味。随着相关研究的拓展,一些被称之为“后麦克法兰学派”的史家试图将物质利益和“宪政”原则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进而从制度史发展变迁上来探究贵族群体的历史作用。他们笃信中世纪的英国有着优秀的价值观与“宪政”理念。因此,贵族注重谋取“公共福利(common good)”,要求参与政府分享权力,反对肆意侵掠臣民财产的独裁暴君。不久前,著名学者阿莫诺就将之归纳为“以财产不可侵犯的思想和法律应当保护所有权的观念”为轴心的价值观和“权力分享原则”。^⑥然而,究竟是物质利益动机还是“宪政”原则对贵族的政治活动具有决定意义,这两者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后麦克法兰学派”对这类重大问题的诠释常陷于模棱两可的境地,其

① A. Tuck, *Crown and Nobility 1272 - 1461*, London, 1985, p. 11.

② J. R. Maddicott, "Poems of Social Protest in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England", in W. M. Ormrod, eds., *Englan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1985 Harlaxton Symposium*, Woodbridge, 1986, pp. 140 - 143.

③ D. W. Hanson, *From Kingdom to Commonwealth: The Development of Civic Consciousness in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1970, pp. 135, 24, 170.

④ J. Watts, *Henry VI and the Politics of Kingship*, Cambridge, 1999, pp. 54 - 55.

⑤ J. Watts, *Henry VI and the Politics of Kingship*, p. 56.

⑥ 蔺志强:《英国中古政治史的学术系谱与模式转换》,《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3期。

中不乏有向“牛津学派”之“辉格模式”复归的情结与趋向。

也正因为上述这种向“辉格模式”复归的情结与趋向,伸张贵族反抗的合理性,将之作为法律与公平的捍卫者乃至整个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维护者的念头,在一些当代史家中再度萌发,而以瓦伦特的观点尤其为甚。他在集中研究了这一时期贵族反叛的理论和实践后,就从这一角度对之大加褒扬。他指出,“至少在直到15世纪的这一段时期中,贵族认为他们有权利去捍卫法律的至尊权威和他们参与政府的角色,如果有必要就诉诸武力”。^①这样做是合理的,“要取得政治让步,就必须依靠武力,因为没有其他手段对顽固的国王强制实行限制。但至少至理查德二世统治时,当贵族认真地承担起他们代表王国只适合共同体的责任,反叛与改革的联接是最成功的”。^②瓦伦特进而对贵族反叛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他指出,“中世纪的武力反叛对英国政治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因为“英国的贵族更多地尝试着用一种实践的手段去捍卫法律、劝谏权利与治国良方”。^③这样的反叛“充当了一种工具,引进并强制实行了强调法律高于国王的权威和共同体参与政府的权利”,而且以此惩罚暴君,回报仁君,“鼓励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合作”。由此而“证明了武力有时是反对践踏权利和自由的唯一有效惩罚”。^④这样的研判,无论在论旨上还是在书写上,难免让人感到这是“辉格模式”当代版的典型范例。不过,瓦伦特自己也感到其论与历史实际似多有疏离,因此也在其著中尽量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对国王和贵族之间暴力冲突的聚焦研究,并不意味着否定合作是政治生活的正常模式,也不意味着要表明贵族的抵抗在整个中世纪后期有着一种有机的连续性”。^⑤

在持续不断的学术论争中,一些史家再度回归到当时的“规劝文学”文本中,对“君主宝鉴”等类作品作进一步考释,以期摆脱困扰,去伪存真,对贵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诉求作更为贴近于历史实际的解读。著名史家内勒德曼堪称典型。他编译并解析了14世纪前期英国的这类作品,如米勒默特的瓦尔特的《论国王的高贵、智慧和节俭》、帕古拉的威廉的《爱德华三世宝鉴》等作品。通过文本的具体解读,内德曼指出:“中世纪英国存在着一个大众的和一定程度流行的政治抗议文学的自豪传统”,但这个传统的内在政治诉求并非对抗与分离,而是参与合作。“在此之前谈到这个问题的学者,都聚焦在从约翰王到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给英国造成反复震荡的国王与贵族的冲突上”,由此得出了所谓的“专制王权”与“有限王权”两种观念的分野与抗衡,这是极不妥当的。事实上,英国王权也深度依赖于贵族作为“王家意志的执行者”来统治国家。因此,王国的日常统治“植根于国王和王国贵族之间的规范化的‘合作’,显示了在所有派别中的显著的合作精神”。^⑥观念上的反映也是如此,“正如从《刘易斯之歌》到福特斯鸠所强调的英国思想所显示的那样,国王和他的封建领主同伙之间合作统治的制度所产生的高度协调的统一意识,绝不是要弱化君权的权力与尊严”。^⑦无论是“君主

① C. Valen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volt in Medieval England*, Burlington, 2003, p. 250.

② C. Valen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volt in Medieval England*, p. 250.

③ C. Valen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volt in Medieval England*, p. 35.

④ C. Valen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volt in Medieval England*, p. 253.

⑤ C. Valen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volt in Medieval England*, p. 2.

⑥ C. J. Nederman,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C. J. Nederman, ed.,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Arizona, 2002, pp. 6-8.

⑦ C. J. Nederman,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C. J. Nederman, ed.,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p. 8.

宝鉴”还是其他作品虽然批评国王,都没有否定国王在议会和行政上的最高统治权威,因为贵族的权利、财富和地位都来自于国王的赐予。当时这类作品的作者崇奉的是“共治”(Co-ruleship)的理想,“根据这一理想,君权的臣民在王国的统治中拥有一种积极支持国王的责任”^①。

三、有关“变态封建主义”

在审视中古后期英国贵族群体的社会政治活动时,西方学者对“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的重要影响也作了诸多深入探讨。“变态封建主义”是19世纪中期著名英国学者普卢默首次建构的,但对之作完整的概念界定则是在“二战”前后。从1931年到1945年之间,著名史家麦克法兰在其相关的论著中,明确把“变态封建主义”看作是盛行于14、15世纪的、以“庇护制”和“扈从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以区别于传统封建制度中以土地占有为基础、以封君封臣关系为纽带的等级依附体制,其核心则是以货币支付相应的土地收益并以此在封君封臣之间建构起以契约来束缚的依附纽带。在“变态封建主义”下,原先的那种以占有土地为条件而建构起来的以臣服效忠和服军役为特征的领主制,就转化为以支付货币的契约来维系的、以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庇护制^②。

有关“变态封建主义”的争论问题颇多,而它的兴起对贵族势力的扩张与贵族群体的政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西方学者争论聚焦之所在。不少史家常常将“变态封建主义”与中古后期世俗大贵族横暴专断、反叛王权的行为有机地联系起来。按照他们的理路,“变态封建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封建军役和效忠原则,由此形成的“庇护制”导致了“超级臣民”(over-mighty subjects)^③的出现,这类大贵族不仅拥有了大批追随者,而且合法地拥有了私家军队,相互间展开激烈角逐,甚至野心膨胀,反叛王权,由此导致了王朝鼎革尤其是玫瑰战争那样的剧烈政治动荡。

早在20世纪40年代,麦克法兰在反复解读“变态封建主义”时就提出,在这一主导的历史现象中,大贵族建构其拓展权威的“庇护制”,利用其恩赐、庇护让更多的中小贵族追随自己,权势显赫,“只有一个傻瓜才会否认贵族的地区性权力是中世纪后期最重要的事实”^④。偏向于强调贵族与王权冲突的塔克,在分析14世纪“变态封建主义”对王权与贵族的影响时,肯定了国王征召“合同军”(contract army)而与法国展开百年战争的意义。他指出,“对于王权来说,合同军有不少益处”,服役者是为了报酬而志愿的,这避免了以往时常出现的强制服役的抱怨,而且服役者的服役期限不像以往的骑士军役制那样受习惯的限制,王权也减少了征召、调集军队与支付给养的事务负担^⑤。然而,塔克更为强调“合同军”制给大贵族及其与王权的关系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其一,“王权失去了对征召兵役的控制权,而让大贵族控制他们自己的军队、指挥他们自己的征伐”,由此强化了贵族的军事权威^⑥。其二,“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为持久性的防卫需要而不断征召“合同军”,“促进了贵族保持

① C. J. Nederman, “General Introduction”, pp. 10 - 11.

② G. L. Harris, ed., *England in the 15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of K. B. McFarlane*, London, 1981, pp. 23 - 43.

③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3.

④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p. 289 - 290.

⑤ A. Tuck, *Crown and Nobility 1272 - 1461*, p. 142.

⑥ A. Tuck, *Crown and Nobility 1272 - 1461*, p. 142.

常备军,并且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次级合同签订者来对之强化”,由此而滋长起大贵族的野心,“而北方大贵族的野心将在14世纪末的国家政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①其三,“合同军制的发展也导致了王权与贵族之间的财政关系的变化”。在14世纪30年代之前,王权常常让拖欠财务署之债务的贵族服役抵债,而“合同军”制的实施,“则将国王置于军事将领之债务人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头衔(爵位)的贵族,由此王权所欠贵族个人的钱款常常数量巨大”。^②同时,许多大贵族通过战争发财,聚敛了大量财富。由此,大贵族比他们的前辈更为表达其政治观点和政治兴趣。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14世纪末和15世纪英国的政治动荡。

针对上述强调“变态封建主义”之负面政治效应的观点,一些学者依据自己的理路和史实阐发了不同的见解。罗森萨尔就认为,“超级臣民的肆意放纵被集中地归结为变态封建主义的结果”,“变态封建主义被说成是使用领受薪金的扈从军队,来取代封臣和次级封臣的所谓在古典封建主义中相互和个人的义务下的服役”,这种“在狭隘的意义上”的理解是不对的。^③事实上,在1290年颁布了《封地买卖法》(Statute Quia Emptores)对土地再分封的禁止,就意味着是金钱而非地产注定要成为私家军队兴起的工具。在拜占庭帝国和罗马帝国后期,都有这样的以薪金来征召军队的现象。而在英国,上溯到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也有不少超过兰开斯特时代的“超级臣民”率领其追随者“将王国变为私家战场”,斯蒂芬王时期的混战割据的“无政府状态”更可证明。因此将“变态封建主义”看作贵族私战乃至“超级臣民”向国王的挑战的原因,并不妥当。^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史家还通过“变态封建主义”的解读来揭示,当时的议会实际上是由贵族操控的政治机构。早在1924年,史家尼勒在考察了1376年至1406年的历史证据后就曾经指出贵族上议院在议会中的重要地位,声称“我们不再需要认定议会中最真实的力量是在国王和下议院之间。在整个可能性看,它是在国王和上议院之间”。由于其成员对贵族有依附性,“下议院是作为上议院的代言人而不是某种独立政策的创建者而存在的”。不久,理查德森通过对大贵族根特与兰开斯特郡的议会代表之关系的研究指出,“答案似乎是议会中下议院的力量并非是它自身的而是上议院的力量”。^⑤麦克法兰更进一步认定,正是“变态封建主义”的影响导致了这一局面。他认为“变态封建主义”并不局限在领主和附庸的“封建关系”上,“它没有如此固定的界限,就像它在其中勃发的社会那样,它有着诸多的变动”。在此形态下,贵族庇护人与其追随者通过“契约”缔结成互利的派别,“无疑这种实践能够极大地扩展大贵族影响的潜在规模”,贵族庇护者要尽一个好领主的职责,为追随者提供好获利的机会与职业,而后者则须尽其所能地为前者效劳,“庇护和效劳就成为当时社会的本质”。^⑥麦氏宣称,“认识到这一点必定修正有关议会属性的一个概念”,那就是长期流行的对下议院独立权力的判定。由此,他质疑“下议院的生气勃勃的独立性”。在他看来,在15世纪,属于下议院议员的骑士(地位比市民重要)的大多数实际上都是上议院议会贵族的依附者、追随

① A. Tuck, *Crown and Nobility 1272 - 1461*, p. 145.

② A. Tuck, *Crown and Nobility 1272 - 1461*, p. 145.

③ J. T. Rosenthal, *Nobles and the Noble Life, 1295 - 1500*, p. 74.

④ J. T. Rosenthal, *Nobles and the Noble Life, 1295 - 1500*, p. 74.

⑤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289.

⑥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290.

者或封臣。^①因此,下议院的政治行为常常受到上议院的影响,而上议院的议员常常又是国王之御前会议的成员。这样,整个议会中的关系错综复杂,下议院也就没有独立的政治立场。^②

沿着麦克法兰的理路,日后不少史家对此作了诸多论证。罗森萨尔通过相关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贵族对议会的重要影响。他强调,“通过控制议会的有关郡骑士的选举则是议会贵族渴望有效实施地方行政的另一个明显的目标”。^③他列举了兰开斯特家族的根特的约翰在自己的领地控制选举的想法,期望让自己的臣属被选入下议院。1376年“好议会”中大胆的下议院发言人,已被证明是边地(March)伯爵内府的管家。这些贵族私臣进入议会议政,与上院议会贵族共同在议会中共处并不值得奇怪,因为“狮子和狼能够在相当程度的和谐上一起行动”。^④而在议会史很有造诣的克拉克则在麦克法兰的影响下在这方面作了更多的卓越研究。克拉克通过对15世纪初作为对下议院选举令状的回应凭据(直接送达中书省)上地方官员头衔的探讨指出,的确,“有一些地方,大贵族的管家或代理人长期明显地让议会代表选举感到他们的存在”,在约克郡和威斯特莫兰德、诺森伯兰德、马歇尔和德汶等伯爵领和兰开斯特公爵领等诸多地区,都存在着大贵族通过管家或代理人干预选举的状况。在1377至1422年间的德汶,尽管选举看来与地方乡绅的意愿并不相悖,但不少于42名被选上的下议院议员与德汶伯爵的关系密切,而且至少有4名是伯爵的亲属。^⑤克拉克还对威斯特莫兰德、沃彻斯特郡、兰开斯特郡这三个大贵族对郡骑士代表选举“直接控制”的地区作了分别的个案解析。此外,在罗斯克尔的《议会史》作简介的3173名下议院议员中,克拉克发现了约占14%的约456名属于贵族的追随者。因此他谨慎地提醒人们不要忽略乡绅与城市力量的崛起对下议院建构的重要影响,而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收到‘变态封建主义’的影响”。但同时,克拉克仍旧强调:“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仍然是,作为郡骑士代表获选的人常常的确是议会贵族的追随者”。所有这些观点,对以往西方学者特别是“辉格”派史学家夸大中世纪英国下议院的权威,无疑是一有力挑战。

西方史学界对中世纪后期英国世俗贵族群体政治活动的诸多历史解读,可谓主旨各异,观点纷陈,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仔细辨析就不难发现,在这一递进折回的学术史的流变过程中,凸显着一个明晰的“去辉格化”的学术理路的演进,那就是逐渐地从主观色彩浓厚的“辉格”派史学的“宪政主义”诠释模式中解脱出来,力图依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语境作尽可能贴近历史实际的诠释。系统追踪、梳理与科学地借鉴这一学术史,对于国内同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世纪英国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孟广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00029)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景德祥)

①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289.

②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 293.

③ J. T. Rosenthal, *Nobles and the Noble Life, 1295 - 1500*, p. 85.

④ J. T. Rosenthal, *Nobles and the Noble Life, 1295 - 1500*, p. 86.

⑤ L. Clark, "Magnates and their Affinities in the Parliaments of 1386 - 1421", in R. H. Britnell & A. J. Pollard, eds., *The Mcfarlane Legacy: Studies in Late Medieval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127 - 129.